

论王鹏运《庚子秋词·渔歌子》的“词史”品格

王馨鑫

(唐山学院 文法系,河北 唐山 063000)

摘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王鹏运《庚子秋词·渔歌子》一词作出进一步笺释,指出此词的重要价值在于揭示了珍妃之死的真相以及珍妃的高洁品格,这也正是《庚子秋词·渔歌子》的“词史”品格所在。以令词之短小篇幅,而能蕴含如此丰富深沉的历史内容,实为罕见,这体现了王鹏运高超的艺术技巧与清刚、正直的品格。

关键词:王鹏运;渔歌子;庚子秋词;词史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9)01-0052-09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9.01.010

On the Character of Ci History in *Yu Ge Zi in Autumn Ci of Boxer Year* (1900) Written by Wang Pengyun

WANG Xin-xin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law, Tangshan University, Tangshan 0630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previous study, the author annotates *Yu Ge Zi* written by Wang Pengyun.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important value of this Ci (lyric poetry) lies in revealing the truth about Concubine Zhen's death and her nobleness, which is the Ci History character of this work. It is rare that the richness of historical content is reflected in such a short Ci and this shows the excellent artistry and honest character of Wang Pengyun.

Key Words: Wang Pengyun; *Yu Ge Zi*; *Autumn Ci of Boxer Year*(1900); Ci History

在近代词史上,王鹏运、朱祖谋、刘福姚等人的《庚子秋词》以相互唱和的方式,写照了庚子事变中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反映了词人灵魂与时代命运的息息相关,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其中,鹑翁(王鹏运)以珍妃命运为主题的《渔歌子·禁花摧》一首,更因其所反映的重要史事而为人所瞩目。此前已有学者特意拈出此词,进行注解、分析,功绩值得肯定^①。但应该

指出的是,由于未注意到其中某些字句背后隐含的“微言”,《渔歌子》中所包含的重要“词史”价值实际尚未被真正抉发出来。本文试图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此词进行更进一步的笺释,以揭示其所隐藏的重要史事内涵,以及王鹏运作为词人所具有的“词史”品格,请各位方家指正。

一、《渔歌子》笺释

笺释之前,需对《庚子秋词》的创作意义及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4ZDB076)

作者简介:王馨鑫(1986—),女,北京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

^① 陈正平《〈庚子秋词〉研究》(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 2008 年版)、卓清芬《王鹏运等〈庚子秋词〉在“词史”上的意义》(《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 5 月)均对此词作出了解析。

版本情况作一说明。首先,关于《庚子秋词》的创作背景,王鹏运《〈庚子秋词〉叙》云:

光绪庚子七月二十一日,大驾西幸,独身陷危城中,于时归安朱古微学士、同县刘伯崇修撰先后移榻就余四印斋。古今之变既极,生死之路皆穷,偶于架上得丛残诗牌百许叶,……乃约夕拈一二调以为程课,……自八月二十六日起,至某月某日止,凡阅若干日,得词若干首,……每夕词成,古微以乌丝阑精书之,伯崇题其端曰《庚子秋词》,盖纪实云。半塘僧鹭记。^[1]

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慈禧太后试图借助义和团的力量对抗外国势力达到专政目的,遂纵容拳民反洋。至五月末,事态激化,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向津、京进犯。七月二十日,北京城破,二十一日黎明,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出京城、奔往西安。光绪二十七年(1901)《辛丑条约》签订后,方于八月二十四日起驾回銮。这一事件,即被称为“庚子事变”或“庚子国变”。

据序文所言,事变发生时,王鹏运“独身陷危城中”,困守斋中;为避乱兵,朱祖谋、刘福姚也先后搬至四印斋与之共居。《庚子秋词》的创作,便是在这样一种“古今之变既极,生死之计皆穷”的氛围中完成的。可知王、朱、刘等于庚子事变中的一系列事件,是以亲历者的身份,以微言写时事,其意义自不同于一般咏史感叹之词。

《庚子秋词》现存版本,主要为清光绪二十七年刻本及民国间有正书局石印本^①。内容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起(庚子年)八月二十六日,迄九月尽,凡阅六十五日,拈调七十一,得词二

百六十八,附和作三十九,共三百又七首”;下卷“起十月朔,迄十一月尽,凡阅五十九日,拈调六十一,得词三百十三,附原作二,共三百十五首”。《渔歌子》出《庚子秋词》卷下,其词云:

禁花摧,清漏歇,愁生辇道秋明灭。冷燕支,沉碧血,春恨景阳羞说。

翠桐飘,青凤折,银牀影断宫罗襪。涨回澜,晖映月,午夜幽香争发。^②

《渔歌子》所咏主题为珍妃之死,在当时已为人所知:清恽毓鼎《崇陵传信录》:“濒行,太后命崔阉自三所出珍妃,推堕井中。……朱学士祖谋、王给谏鹏运赋《落叶词》纪其事。”^{[2]68}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再谈珍妃之死”条亦云:“以予所知,……王半塘《庚子秋词》乙卷,调寄《渔歌子》,……其中托词寓讽,率指兹事(珍妃之死)。”^[3]

(一)“禁花摧,清漏歇,愁生辇道秋明灭”笺释

“禁花摧”,唐王涯《宫词》:“春风摆荡禁花枝,寒食鞦韆满地时。又落深宫石渠里,尽随流水入龙池。”^{[4]3888}五代尹鹗《满宫花》:“风流帝子不归来,满地禁花慵扫。”^[5]用“禁花”点明所咏乃后宫妃子。同时朱祖谋亦有《声声慢·落叶词》:“香沟旧题红处,拚禁花、憔悴年年。”^{[6]203}

“清漏歇”,指凌晨时分。唐权德舆《奉和李相公早朝》:“五更钟漏歇,千门扃钥开。”^{[4]3615}清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七月二十日,英军陷京师。翌日,联军继之。两宫黎明仓皇乘民车出德胜门。……濒行,太后命崔阉自三所出珍

① 按:《庚子秋词》清光绪二十七年刻本,白纸本,半叶十行,行二十字,黑口,左右单边,单鱼尾,封面题“辛丑冬月古微前辈持赠,莫生记”字样(辛丑,清光绪二十七年。莫生即万莫生,尚书万青藜之子,与王、朱皆友善);卷首题“庚子秋词二卷,春蛰吟附”,有永嘉徐定超叙,半塘僧鹭记,张亨嘉、宋育仁、刘恩馥题辞,国家图书馆藏,索书号:99733。有正书局石印本,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黑口,左右单边,单鱼尾,前有永嘉徐定超叙、半塘僧鹭记、复葦题辞,国家图书馆藏,索书号:86912。另有清末刻本两种,其一有“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铃印,内容、形制与光绪二十七年刻本同,惟前多俞陛云、张仲炘题辞;其二一函四册,形制、内容与光绪二十七年刻本完全一致,惟四张纸一叶,厚度大大增加,故析为四册。此两刻本当为后出。本文所引文字,以光绪二十七年刻本为底本,校以有正书局印本。

② “秋明灭”,底本作“秋明威”,据有正书局本改;“襪”,有正书局本作“袜”;“晖”作“辉”;“沉碧血”原作“沈碧血”,径改。

妃,推堕井中。”^{[2]68}清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亦云:“二十一日,天未明,……珍妃有宠于上,太后恶之,临行推堕井死。”^{[7]449}“禁花摧,清漏歇”二句,言凌晨时分,珍妃遭到摧折,即被害。

“愁生辇道秋明灭”:辇道,指由珍妃被囚之故宫东北角景祺阁后东北三所^①至颐和轩的甬道。《汉书》卷五十七《司马相如传》:“辇道纚属。”颜师古注:“辇道,谓阁道可以乘辇而行者也。”^[8]“秋明灭”,杜甫《北征》:“旌旗晚明灭。”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越人语天姥,云霓明灭或可睹。”此句言珍妃于秋日凌晨明灭黯淡的光线中走上去往颐和轩的甬路,心中忧愁渐生。

何荣儿口述,金易、沈义羚著《宫女谈往录》云:“由东北三所出来,经一段路才能到颐和轩。我(崔玉贵)在前边引路,王德环在后边伺候。我们伺候主子向例不许走甬路中间,一前一后在甬路旁边走。小主一个人走在甬路中间,一张清水脸儿,头上两把头摘去了两边的络子,淡青色的绸子长旗袍,脚底下是普通的墨绿色的缎鞋(不许穿莲花底),这是一幅戴罪的妃嫔的装束。她始终一言不发,大概她也很清楚,等待她的不会是什么幸运的事。”^{[9]205}

“秋明灭”写秋日凌晨光线晦暗不明的样子,同时也暗示人物心情的起伏不定,似乎已预感到自己即将遭到厄运,正可与《宫女谈往录》中所言“她始终一言不发,大概她也很清楚,等待她的不会是什么幸运的事”相参证。

需要指出的是,《宫女谈往录》言珍妃被害之时间乃是七月二十日下午,与恽毓鼎、李希圣

之说法有所出入:

七月二十日那天中午,我(崔玉贵)想乘着老太后传膳的机会,传完膳老太后有片刻嗽口吸烟的时间,就在这时候请膳牌子最合适。……就在这时候,老太后吩咐我,说要在未正时刻召见珍妃,让她在颐和轩候驾。^{[9]203-204}

《宫女谈往录》所述珍妃被害事,乃是当事人(推珍妃入井之凶手)崔玉贵亲口所说、宫女何荣儿转述,于情于理,均无伪造掩盖之可能,故当为珍妃被害一事最可信之史料。珍妃被慈禧太后下令推入井身亡,毕竟为宫闱密事,恽、李之记述,或可能得之于宫人之口,或可能得之于递相转述,究非第一手材料,于事件发生时间上有所舛误,情有可原。至于王鹏运词作何以亦出现此时间上之误差,下文还将论及,兹不赘。

(二)“冷燕支,沉碧血,春恨景阳羞说”笺释

“燕支”,即“胭脂”。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景阳井,一名胭脂井,又名辱井,在台城内。陈末后主与张丽华、孔贵嫔投其中,以避隋兵。其井有石栏,多题字。旧传云:栏有石脉,以帛拭之,作胭脂痕。或云石脉色类胭脂。”^[10]珍妃井,在颐和轩北、贞顺门内^②。贞顺门为宁寿宫宫墙北门,北向,门外西行可至神武门。珍妃井即在门内,距门口仅数步之远,周围亦有石栏。由颐和轩出,沿连廊北行,半分钟可至井^③。此句盖以有“燕支”痕之景阳宫井暗指珍

① 按: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崔玉贵谈珍妃之死”一节云:“景祺阁北头有一个单独的小院,名东北三所,正门一直关着。……珍妃住北房三间最西头的屋子,屋门由外倒锁着。”据此可知珍妃被囚之所,为故宫宁寿宫东北三所,具体位置位于宁寿宫后区景祺阁北、贞顺门南。宁寿宫后区中路建筑,由南往北依次为乐寿堂、颐和轩、景祺阁、东北三所。今故宫博物院景祺阁区域封闭,故无法得知东北三所之详貌。

② 一说现故宫博物院内所标示“珍妃井”并非珍妃遇害之地,其井实在颐和轩内。然据《宫女谈往录》“崔玉贵谈珍妃之死”节所云:“我(崔玉贵)和王德环一起连揪带推,把珍妃推到贞顺门内的井里。”以及“庚子出逃前”节所云:“(慈禧太后)领着人,向后走,绕过颐和轩,路经珍妃井,直奔贞顺门。”可知珍妃井确在贞顺门内,而非颐和轩内。

③ 井旁侧有小门,可通景祺阁及东北三所。由颐和轩至井,走此路当更为快速。但目前小门及景祺阁均处于锁闭状态,无法入内详察。

妃殒命之宁寿宫井。

“沉碧血”，出《庄子·外物》：“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员流于江，苾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唐成玄英《疏》：“碧，玉也。……苾弘遭谮，被放归蜀，自恨忠而遭谮，遂刳肠而死。蜀人感之，以匱盛其血，三年而化为碧玉，乃精诚之至也。”^[11]此句明确指出：珍妃“忠而遭谮”，一腔碧血沉于井中。

“春恨景阳”，《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七隋文帝开皇九年春正月甲申：“陈主……从宫人十余出后堂景阳殿，将自投于井，……乃得入。既而军人窥井，呼之不应，欲下石，乃闻叫声。以绳引之，惊其太重，及出，乃与张贵妃、孔贵嫔同束而上。”^[12]

《宫女谈往录》云：

珍妃说，我没有应死的罪！

老太后说，不管你有罪没罪，也得死！

珍妃说，我要见皇上一面。皇上没让我死！

太后说，皇上也救不了你。把她扔到井里头去。来人哪！

就这样，我（崔玉贵）和王德环一起连揪带推，把珍妃推到贞顺门内的井里。珍妃自始至终嚷着要见皇上！最后大声喊，皇上，来世再报恩啦！^{[9]206}

此句表明珍妃死于井中，但她不是像陈后主、张丽华那样为避兵而自投其中，而是一腔碧血、被人所害，因而词言“景阳羞说”。“羞说”，即羞于启齿、对某事感到羞耻。唐陆龟蒙《甫里集》卷四《江南秋怀寄华阳山人》：“学徒羞说霸，佳士耻为跼。”^{[4]7212}清金和《秋蟪吟馆诗钞》卷一《题庆子元白门访旧图》：“樽前且呼酒，羞说泪沾衣。”^[13]虽是藉陈后主与张丽华投井避兵之事来咏叹珍妃之死，但作者着重指出“羞说”，意即珍妃绝非自投井而死，这是作者希望读者重点关注到的。1916年，甲寅杂志社出版《说元室述闻》，其中“纪珍妃轶事及辨殉国异闻”条末尾云：“近见某氏笔记，乃力辨妃于孝钦出宫后，追随不及，始自行投井者。妄也，附辨于此，读者勿为所惑。”^[14]而半塘于庚子事变当时，似已预见到此种诬蔑行径之产生，特以“羞说”二

字点明珍妃绝非自杀，其词之信史品格，由此可见。

（三）“翠桐飘，青凤折，银牀影断宫罗襪”笺释

“翠桐飘”，以桐叶飘坠喻珍妃之死。晋王嘉《拾遗记》：“汉武帝思怀往者李夫人，不可复得，……自造歌曲，使女伶歌之，……因赋《落叶哀蝉》之曲。”^[15]宋陆游《幽居》：“井桐飘叶觉秋深。”^[16]

“青凤折”，唐李贺《天上谣》：“窗前植桐青凤小。”宋吴正子注：“西蜀有桐花鸟，似凤。故杜诗（按：应为苏诗）云：‘桐花集么凤。’小凤也。”^[17]桐叶飘坠，青凤夭折，以形象笔触写珍妃之被害，极为动人。

“银牀”，即井栏。杜甫《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露井冻银牀。”钱谦益注：“《淮南王篇》：‘后园凿井银作牀，金瓶素绠汲寒浆。’梁简文《双桐生空井》诗：‘银牀系辘轳。’庾肩吾《九日》诗：‘银牀落井桐。’吴曾曰：‘《山海经》：崑仑墟有九井，以玉为檻。银牀者，以银作阑，犹《山海经》所谓以玉为檻耳。’”^[18]一说银牀非井栏，乃辘轳架也。

“罗襪”，三国魏曹植《洛神赋》：“陵波微步，罗襪生尘。”^[19]“银牀影断宫罗襪”，指井边人影已逝，空留她曾穿过的罗襪。以洛神宓妃射其身份及死于水中。

（四）“涨回澜，晖映月，午夜幽香争发”笺释

“幽香争发”，晋干宝《搜神记》：“初，钩弋夫人有罪，以谴死。既殒，尸不臭，而香闻十余里，因葬云陵，上哀悼之。又疑其非常人，乃发冢开视，棺空无尸，惟双履存。”^[20]《史记》：“上居甘泉宫，……欲立少子也。后数日，帝遣责钩弋夫人，夫人脱簪珥叩头，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狱。’夫人还顾，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人死云阳宫。”^[21]以钩弋夫人被谴死之古典，喻珍妃被害之今典，其相同点在于二者都是本身并无罪过、而因政治原因遭到杀害。其无罪，一方面指珍妃被害前所言“我没有应死的罪”，另一方面指其平日的品行高洁、素无瑕疵。

“幽香”与“碧血”相互映照,意谓珍妃并无过错,和钩弋夫人一样,是被妄加罪名、无罪而死。她为国为君的节义,终当为人所知。

综上,王鹏运《渔歌子》咏珍妃之死,隐晦地写出了其被害的时间(“清漏歇”)与地点(“景阳(井)”),且其中有两个不可忽视的重点:一、以“羞说”表明珍妃绝非自投井而死,而是被人所害;二、以“碧血”“幽香”表明珍妃生前并无过错,是“忠而遭谮”、无罪而死。这两点的结合,是当时乃至后来的诗词作品所甚少做到的,堪称具有高度“词史”意识的“实录”^①。

二、王鹏运了解珍妃被害真相之途径

那么,王鹏运何以能得知珍妃并非自杀?在当时普遍认为珍妃“卖官”的情况下,他又为何坚持珍妃一腔碧血、并无过错?这实际与他的身份、品行、交游等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事变发生时,王鹏运表面上仍以礼科给事中之身份在官,实际却已形同斥逐、地位尴尬^②。然而即便是此种状况下,当两宫出逃、京内大乱时,他也没有如众多“士大夫之官京朝者”一样“仓皇戎马、奔驰星散”,而是“独闭户如故”,坚持留在京城。这使他能够及时了解更多的消息与内情。事实上,有关两宫出逃、珍妃之死的消息,很有可能在事变发生后不久即已流传开来了:《宫女谈往录》指出,七月二十日晚,宫中已有出逃迹象,且珍妃被害之消息,此前已为宫人所知:

其实,就在这一天(按:指七月二十日),这个时候,这个地点,老太后赐死了珍妃,她让人把珍妃推到颐和轩后边井里去了。我们当时并

不知道,晚上便有人偷偷地传说。……^{[9]200}

这天晚上,……又说好多寿膳房的人当了义和拳的都逃走了。我们当然心惊胆战!

正赶上我上夜(值夜班),到丑末寅初(三点四点之间)的时候,突然听到四外殿脊上,远远地像猫叫,尾声很长。……我悄悄地出来,知会外边守夜的人,因为我们心里有鬼。……知道昨天珍妃死在井里,以为她冤魂不散显灵来了。^{[9]212}

清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二十一日,(两宫出逃)……诸宫人皆委之而去,赴水死者数十人,其余走出安定门,遇溃兵被劫,多散失。……王公士民,四出逃窜,城中火起,一夕数惊。”^{[7]449}随着宫人出逃禁中、四散城内,两宫西狩,珍妃被害的消息,也必然渐渐流播人耳、为人所知。七月二十一日事变发生,至《庚子秋词》开始创作之八月底,王鹏运等留京士大夫于此已有相当了解,实属自然。王鹏运、朱祖谋之友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中,即对当时的情况有详细记载:

七月二十日,英军陷京师。翌日,联军继之。两宫黎明仓皇乘民车出德胜门。甫出门,白旗遍城上矣。太后御夏衣,挽便髻,上御青绸衫,皇后及大阿哥随行,妃嫔军从者。濒行,太后命崔阁自三所出珍妃(三所在景运门外),推堕井中。……联军入,日本军护禁城,内庭晏然,乃出妃尸于井,浅葬京西田村。(朱学士祖谋、王给谏鹏运赋《落叶词》纪其事,余亦赋诗云:“金井一叶堕,凄凉瑶殿旁。残枝未零落,映日有辉光。沟水空流恨,霓裳与断肠。何如泽畔草,犹得宿鸳鸯。”) ^{[2]68}

① 按:清末咏珍妃之死的作品,多未涉及到其品行,而只是哀悼她的华年遽逝,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势倾颓,故多将其与杨贵妃相比拟(如曾广钧《庚子落叶词》);涉及其品行的,则多数为慈禧太后懿旨所蒙蔽,认为珍妃确有“卖官”行径,品行有瑕(此点后文还将辩及,此处不赘)。少数知其诬枉并写出者,则已多为民国间作品,于时文禁已无、消息流播,自可书写。但处在庚子年事件发生之时就了解这些情况,且敢于在作品中写出者,除王鹏运此词外,未见其他,“实录”之名,庶几无愧。

② 况周颐《礼科掌印给事中王鹏运传》:“试俸期满,援例截取,奉旨以简缺道员用。……故事,京曹截取,皆以繁缺用;以简缺用者,自鹏运始。”又《眉庐丛话》:“向来京曹截取道府,皆以繁缺用,以简缺用者,不用之别名也。”见张正吾等编《王鹏运研究资料》,漓江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3,44 页。

光绪二十六年事变发生之时,据曹允源《原任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学士恽府君墓志铭》,恽氏并未离京:

庚子拳匪之役,八国联军长驱闯京师,车驾仓皇西狩,人心汹惧。府君独偕吏部尚书敬信公单车入使馆,与各国使臣商保卫地方之策,力争主权。创协巡公所,令司坊官莅所判决民事,民遂安堵。会事平,特疏吁请回銮。^[22]

两宫出逃之时,恽氏身在京中,又素有探听消息的条件与渠道,故《崇陵传信录》中记载两宫出逃及珍妃之死,与《宫女谈往录》相印证,多有相合之处。惟珍妃被害之时间,误作七月二十一日凌晨。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此事毕竟为宫闱密事,恽氏获知之消息于事件发生时间上有所舛误,也属正常。除恽氏外,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亦云:“二十一日,天未明,……珍妃有宠于上,太后恶之,临行推堕井死。”^{[7]449}成本璞《李先生墓表》言:“未几,有庚子联军入京之变,乱兵大掠,先生仅以身免。”^[23]可知李希圣当时亦在京。

恽毓鼎、王鹏运及李希圣在珍妃被害时间上不约而同出现这一错误,恰可证明此消息已流播人耳。三人或从不同渠道听闻此消息,或彼此间有所联系而递相传述,皆有可能。于时流言虽多,谣言则少,故虽时间上有所舛误,然于珍妃生死之大节——被害而绝非自尽,三人皆以史家应有之品格,作出了真实的记录。

三、王鹏运了解珍妃品行之途径

综上,可知王鹏运因在庚子事变发生时选择留在京城,由此得以获知包括珍妃之死在内的宫闱消息,并以“春恨景阳羞说”这样隐晦却优美的微言,对珍妃的节义进行了赞颂。事实上,王鹏运本人也是一位饶有品节的臣子,监察御史的身份与正直敢言的个性,使他与珍妃之兄志锐、珍妃之师文廷式等“帝党”成员立场相

似、素有往来,而他对珍妃素行、品格的了解,也正来源于此。

王鹏运《八声甘州·送伯愚都护之任乌里雅苏台》云:

是男儿万里惯长征,临歧漫凄然。只榆关东去,沙虫猿鹤,莽莽烽烟。试问今谁健者?慷慨着先鞭。且袖平戎策,乘传行边。老去惊心鼙鼓,叹无多忧乐,换了华颠。尽雄虺琐琐,呵壁问苍天。认参差、神京乔木,愿锋车、归及中兴年。休回首,算中宵月,犹照居延。^{[24]8}

题目中的“伯愚都护”,即志锐,字伯愚,他塔拉氏,光绪六年进士,瑾、珍二妃之堂兄^①。光绪二十年,“以其妹瑾珍两妃贬贵人,降授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释兵柄”。赴任之日,文廷式、盛昱、王鹏运、沈曾植等送之^②。其时二妃遭贬、志锐外放,“帝党”遭到一系列打击,所处政治局势之险恶,人所共知。在此情况下,王鹏运仍送其赴任并赋词为之壮行,可见彼此间乃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同道,而非泛泛之交。

据《半塘定稿》《文廷式集》,王鹏运与志锐、文廷式、安维峻等人的交往,应始于光绪十九年其任江西道监察御史之后,光绪二十、二十一年间,尤为密切。兹简述如下:

光绪十九年七月,王鹏运补江西道监察御史缺。^{[25]10}

光绪二十年七月,王鹏运上《倭夷肇衅,请任亲贤以资戡定折》,坚定站在主战立场。^{[25]82}

九月二十九日,安维峻、王鹏运联衔上疏,请易督办军务大臣李鸿章,并荐户部尚书崇绮及国子监祭酒盛昱,王鹏运疏中言:“今倭夷猖獗,敢肆凭凌,……政府之臣……甚或阳图守御,阴主和议,为苟且目前之计。”^{[26]84 [25]88}

十月二十九日,慈禧太后谕旨将瑾、珍二妃贬为贵人。^{[27]523}十一月,志锐被外放为乌里雅苏台参赞,王鹏运以词送之。

① 按:志锐之祖父裕泰有子长善、长敬、长叙,其中长敬为志锐之父,长叙为瑾、珍二妃之父。参《清史稿·志锐传》《裕泰传》及《清史纪事本末》“光绪十五年”条。

② 参文廷式《八声甘州·送志伯愚侍郎赴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之任,同盛伯羲祭酒、王幼霞御史、沈子培刑部作》,汪叔子编《文廷式集》下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411页。

十二月,福建道监察御史安维峻上疏弹劾李鸿章,并谏慈禧“遇事牵制”(是疏之上,文廷式实主其事),遭革职戍军台,文廷式集银万余,以送其行。^{[28]1496}半塘作《满江红·送安晓峰侍御谪戍军台》以送之,有“尚记得、悲歌请剑,更阑相视”之语。^{①[24]8}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王鹏运上《割地讲和万不可行,请旨寝罢以坚战局折》^{[25]102-104},文廷式《琴风余谭》:“临桂王幼霞御史争割地一疏,有云:‘闻李鸿章奏调随员,有伊子李经方及道员马建忠、罗丰禄诸人。乱臣贼子,狼狈为奸,其可寒心,不啻兵临城下。’自谓警句,为余诵之。时论亦颇谓然。”^{[28]791}

此年春,文廷式作《祝英台近》(翦鲛绡),半塘有和作《祝英台近·次韵道希感春》^{[28]1410[24]12}。《味梨集》中二人唱和之作,前后有十三阙之多。

四月,文廷式乞假(实为避祸)出都,半塘以《木兰花慢·送道希学士乞假南还》送之。^[29]此后几年间,二人亦有《鹧鸪天》、《高阳台》等词作往来。

其志同道合,则可由诸奏疏见出: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王鹏运《割地讲和万不可行,请旨寝罢以坚战局折》:“不知图目前一日之苟安,贻后日无穷之远患,实不如一意主战,百折不回,尚有转机之可冀矣。”^{[25]103}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文廷式《和议难成恳速断大计以抒天下之愤折》:“臣愿皇上……永不复言和议。”^{[28]57}

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安维峻《请诛李鸿章疏》:“皇太后既归政皇上矣,若犹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26]119}

光绪二十二年王鹏运《请暂缓园居疏》:“皇太后园廷驻蹕,顺时颐养,以迓祥和,诚天下臣民所至愿;若皇上六飞临驻,揣时度势,有不得不稍从缓图者。……伏愿皇上……颐和园驻蹕,请暂缓数年。”^{[25]11-12}

光绪二十年六月文廷式《敬陈管见折稿》:

“臣愿皇上宏大纲,持坚断,博采古今,详录众论,择其大者、远者,次第行之,则天下幸甚!”^{[28]5}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王鹏运《请行实政以图内治而弭外侮折》:“中国之积弱年复一年,外侮之凭陵日甚一日,……亟望一申乾断,明定国是之归,以大雪积年之耻者也。”^{[25]136}

从以上交游痕迹及奏疏可知,王鹏运与文廷式、志锐、安维峻等政治立场一致,具体表现在:①主战;②促慈禧归政;③寄望于光绪。知此数点,方能对半塘何以能知珍妃品格有所了解。

兹再辨志锐之外放乌里雅苏台因何事而起。《光绪朝上谕档》载:

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八日,内阁奉上谕:志锐着赏给副都统衔,作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照例驰驿前往。钦此。^{[27]539}

此前十月二十九日,《光绪朝上谕档》有慈禧皇太后懿旨:

本朝家法严明,凡在宫闱,从不干预朝政。瑾妃、珍妃承侍掖庭,向称淑慎,是以优加恩眷,洊陟崇封。乃近来习尚浮华,屡有乞请之事,皇帝深虑渐不可长,据实面陈。若不量予儆戒,恐左右近侍藉为夤缘蒙弊之阶,患有不可胜防者。瑾妃、珍妃均着降为贵人,以示薄惩而肃内政。钦此。^{[27]523}

十一月八日志锐之外放乌里雅苏台参赞,乃十月二十九日瑾、珍二妃遭贬事件之余波。此点人所共知,然于二妃被贬之原因,则甚少注意。《清史稿·志锐传》仅言“以其妹瑾珍两妃贬贵人,降授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释兵柄”,于二妃何以被贬,则避而不谈;今人有注王鹏运《八声甘州》者,言“中日甲午之战失利后,翁同龢、志锐及珍妃等人支持光绪变法维新,事为慈禧所觉,乃搜光绪宫中,得珍妃西装影片一张,大怒,立杖珍、瑾二妃,并皆降为贵人”云云,变法维新、西装影片者,与此次事件实无关涉,未

① 按:此处“悲歌请剑,更阑相视”,盖指此前九月二十九日与安维峻联衔参劾李鸿章事。

知何从立论。实则十月二十九日懿旨中已言明二妃降为贵人是因“近来习尚浮华，屡有乞请之事”。清末胡思敬《驴背集》“卖爵西园值几钱”诗注云：

上亲政后，(珍)妃颇干与外事。鲁伯阳进十万金，擢上海道，诏下而军机处不知其名。太后大怒，召妃至颐和园，杖五十，降为贵人，谪其兄志锐于边。^{[6]95}

意即珍妃之遭贬，乃是由于接受鲁伯阳贿赂，为之在光绪帝前有所乞请之事。当时与胡思敬同样为此懿旨所蒙蔽、欺骗者不在少数，皆认为珍妃“卖官”。实则珍妃收受十万金贿赂之事，根本子虚乌有；其“习尚浮华，屡有乞请”之罪名，乃是慈禧太后对其的诬蔑、冤枉。由珍妃遭贬后第二天慈禧太后谕旨所刻的两块禁牌绝口不言“乞请”一事，即可明白这一点^①。即不由此两块禁牌，从志锐、文廷式等的品行，也可知此事实乃诬蔑。《清史稿》记，志锐“光绪六年成进士，……与黄体芳、盛昱辈相励以风节，数上书言事”；宣统年间赴伊犁之前，“以手书徧告戚友，言以身许国，不作生入玉门想”，最终死于伊犁。而文廷式的品节，亦自不必说。有如此兄长、师傅，珍妃焉能为受贿卖官、乞请干政之事！

慈禧太后何以要诬蔑珍妃以干政乞请之罪名？其原因一方面是挟私报复，因自己为光绪帝所选皇后受到冷落，故诬蔑、惩罚受宠爱之珍妃；另一方面，则是为打击光绪帝及“帝党”。甲午中日战争，“帝党”成员坚定站在主战一方，与慈禧太后等主和派之间矛盾尖锐。志锐之遭外放，事实上与其主战的态度和手里掌握的兵权亦不无关系。《清史稿》：“东事起，(志锐)上疏画战守策，累万言。虑陪都警，自请募勇设防，称旨，命赴热河练兵。未踰月，以其妹瑾珍两妃贬贵人，降授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释兵柄。”无论是坚持主战的态度，还是有可能被光绪帝一方掌握的一点点兵权，在慈禧太后看来，都是不

可原谅的。换言之，无论是对珍妃的诬蔑，还是对志锐的斥逐，其根本目的都是对光绪皇帝和“帝党”的打击。

综上，可知志锐之被滴乌里雅苏台参赞，是因受到瑾、珍二妃被贬的牵连；而二妃之被贬，则是由于慈禧太后为挟私报复、打击光绪及“帝党”，而给珍妃扣上了受贿卖官的罪名。

现在回到本章节开头所引王鹏运《八声甘州·送伯愚都护之任乌里雅苏台》。志锐此行，直接原因是由于受到珍妃“屡有乞请”一事的牵连，而此事，“帝党”人所共知，乃为冤案。文廷式在光绪二十二年所作的《闻尘偶记》中，就已对鲁伯阳得官之途径作过隐约的透露^{[28]744}。而王鹏运其时与志锐、文廷式立场一致、关系密切，于此事焉有不知之理？即便不清楚其中细节，据其平日与志锐、文氏等的相处、交游，亦不至不了解其品行而对此罪名毫无怀疑。明乎此，则王鹏运写下“碧血”“幽香”等微言，是要道出珍妃“忠而遭谮”、无罪而死的事实，为她洁白无瑕的品行留下记录，可以无疑。

综上所述，王鹏运《渔歌子·禁花摧》一词中最关键之微言，在于“羞说”及“碧血”“幽香”六字。前者表明珍妃绝非自投井而死，而是被人所害；后者表明珍妃生前并无过错，是“忠而遭谮”、无罪而死。其所要表达的核心情感，是为珍妃这位贞烈女子之惨死鸣不平，为饱受打击的主战派、自己的友人志锐、文廷式等鸣不平。《渔歌子》，以及整部《庚子秋词》，是在庚子国变这样一种天翻地覆般的巨变中，满含深痛写下的字字血泪的篇章。

庚子之变后有关珍妃的吟咏中，不乏长篇联章者。与之相比，王鹏运《渔歌子》仅以“碧血”“景阳羞说”“幽香争发”等微言隐晦地点出珍妃无罪及被害坠井的两个事实，显得幽微而难解。这自然与清廷尚未覆亡、思想控制仍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仅以这寥寥数语、仅以

^① 参李松龄《慈禧挟制珍妃的两块禁牌》，《紫禁城》1986年第3期。另，关于珍妃“乞请”罪名之冤，蔡慧《金兆蕃〈宫井篇〉发微》（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已辨之甚详，不赘。

全词 50 个字的极小篇幅,却能够揭示旁人需要长篇大论才能表达的内容,王鹏运何以能被冠以“清季四大词人”之称,于此可见一斑。比高超的艺术技巧更重要的是,王鹏运敢于直言上疏、敢于在乱兵中坚留京城,这是他能够得到文廷式等人的友谊、能够知晓珍妃之死的内情、能够写出这篇优秀作品的前提。《渔歌子》的“词史”品格正在于此。

参考文献:

- [1] 王鹏运,朱祖谋,刘福姚,等.庚子秋词[M].清光绪二十七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索书号:99733.
- [2]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7.
- [3]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M].北京:中华书局,2008:143.
- [4] 彭定求.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99.
- [5] 赵崇祚.花间集[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56.
- [6] 阿英.庚子事变文学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7]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M]//续修四库全书:第 446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8]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2557.
- [9] 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
- [10] 周应合.景定建康志[M]//南京稀见文献丛刊:第 2 册.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459-460.
- [11] 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4:920-921.
- [12]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07:2127.
- [13] 金和.秋蟪吟馆诗钞[M].胡露,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33.
- [14] 说元室述闻[M].上海:甲寅杂志社出版,亚东图书馆印行,1916:92.
- [15] 王嘉.拾遗记[M].齐治平,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115.
- [16] 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135.
- [17] 吴正子.笺注评点李长吉歌诗[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078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495.
- [18] 钱谦益.钱注杜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277.
- [19] 昭明太子.文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404.
- [20] 干宝.搜神记[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33.
- [21] 司马迁.史记[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9:661.
- [22] 卞孝萱,唐文权.辛亥人物碑传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644.
- [23] 闵尔昌.碑传集补[M]//清代传记丛刊:第 120 辑.台北:明文书局,1985:753.
- [24] 王鹏运.半塘定稿[M].南京:京华印书馆,1948.
- [25] 张正吾,蓝少成,谭志峰.王鹏运研究资料[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
- [26] 安维峻.谏垣存稿[M].杨效杰,校点.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
- [2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上谕档:第二〇册(光绪二〇年)[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 [28] 汪叔子.文廷式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3.
- [29] 王鹏运.王鹏运词选注[M].刘映华,注.桂林: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51.

(责任编辑:李秀荣)